评弹与文化广场

吴宗锡

评弹演出场所的大小和多少，评弹听众的多少，都是衡量评弹繁荣与否的标志。早期评弹演出是在村舍茶肆，仅有几十到一两百个座位。若遇名家响档，听众超过两百，所谓“双出百”，已是不容易的了。评弹进入大中城市后，听众渐多，有了专业书场，座位扩大到四五百座。随着广播电台的兴起，有了“空中书场”等设施，听众面就更大了。上海解放后取缔了舞厅，改建了书场，座位扩大至八百、近千个。有时还去剧场演出，有两千左右的座位，还常满座。1959年评弹进入近万座的文化广场演出，可以说是其巅峰期的一个标志。

文化广场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演出场所，舞台台深约19米，台口约21米，座位近万。此前，评弹从未进过这样的大场子。那是在1957年8月，上海音乐家协会在文化广场举办“星期音乐会”戏曲专场，邀请上海评弹团参加。蒋月泉、朱慧珍双档在专场中演唱了弹词开篇，听众反响热烈。上海评弹团由此产生了进文化广场演出的设想。1958年夏，为了满足听众的需求，也为了国家在经济困难时期回收通货的要求，上海评弹团开始了进入文化广场的首场演出。

第一场演出是在1959年7月11日，名称是“开篇·选曲·分回大会串”，包括严雪亭、朱雪琴的《杨乃武》选回，杨振雄、杨振言、朱慧珍的《长生殿·絮阁》，开篇选曲有蒋月泉《莺莺操琴》，徐丽仙《新木兰辞》，江文兰《大九连环》，周云瑞《私吊》，张鉴庭《懒惰胚拾鸡蛋》等。评话有张鸿声、姚声江的《八虎闯幽州》。第二场是7月12日，节目为严雪亭、张鉴国《顾鼎臣》的选回，朱雪琴、郭彬卿的《梁祝·十八相送》，开篇选曲有蒋月泉《战长沙》，徐丽仙《黛玉焚稿》，朱慧珍、江文兰《夏收夏种》，薛筱卿《见姑娘》，周云瑞《情叹·离魂》，杨振雄、杨振言《武松·杀庆》等。

这两场的票价分2角、3角5分、5角三种，团体票限购50张，个别票限购5张。放票后立即就有听众排队。结果，两场共售出一万三千余张，平均每场六千多张，演出时剧场反应热烈，演出后好评不绝。听众来信要求经常安排，定期演出。评弹演员们原本惯于中小型的书场，对这样广场式的大场子，不免有些紧张。但演出后觉得，文化广场的音响设备非常好，听众都能集中精力欣赏，场内秩序井然，迅即建立了信心，说噱弹唱演左右逢源，各显神通。

自1959到1961年，逢节庆日或暑期，上海评弹团都常组织去文化广场演出。每场演出各具特色，除演出整旧的传统书目和新编的历史节目外，1960年春节还演出过两场原创现代书目，包括青年队的《向秀丽》，蒋月泉的开篇《迎春曲》，徐丽仙的《开门红》，朱雪琴、郭彬卿的《保炉英雄》，杨振雄、杨振言的对白开篇《万水千山赶牛来》，蒋月泉、徐丽仙的短篇《错进错出》，严雪亭、朱慧珍的短篇《礼拜天》等。最后还有全团的大联唱《上海英雄颂》，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其时，以评弹谱唱毛泽东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获得全国的好评，上海评弹团见此，更发动演员们多搞诗词谱曲，出现了不少新作。1960年7月30日、31日，为庆祝建军节，上海评弹团在文化广场演出了以诗词谱曲为主的专场，节目有谱唱的毛泽东诗词《蝶恋花》《送瘟神》《沁园春·长沙》《长征诗》《六盘山》以及开篇《毛泽东思想放光芒》等。

在文化广场演出，激发了评弹演员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吴子安和张效声双档演出评话《威振海外》时，将道具折扇改为实物乒乓球拍，虚中有实，虚实并济，突出了“球拍扬威”的主题；张鉴庭在演出《懒惰胚拾鸡蛋》和《暴落难》开篇时，凭其演出经验，改坐唱为走场，利用舞台空间加强了表演和动作，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为适应大舞台的演唱，上海评弹团倾全团之力编演了大联唱《上海大英雄颂》，由蒋月泉、严雪亭、张鉴庭、薛筱卿、朱雪琴、徐丽仙等各流派唱腔的创始人以及流派唱腔的正宗传承者朱慧珍、周云瑞等，演唱当时上海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劳动模范，激情充沛，声势浩大，激励起全场近万听众热情沸腾。除上海评弹团老中青演员轮番登场外，演出中有几项还邀请了评弹青年培训班成员、业余评弹辅导班骨干参加，成了上海评弹界的一件盛事。凡参加了文化广场演出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引以为豪，过了几十年，还对之津津乐道。

评弹进文化广场演出，是新中国成立后评弹艺术革新、创新成果的一次大展示，是上海评弹团建团近十年来在书目创新整旧、艺术的创新发展上的一次大总结，也是上海广大评弹爱好者的一次大欢聚，可以说是评弹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

难忘当年插秧忙

郭树清

当年我在海军部队服役，部队有一个农场在辽宁盘锦大洼地区，主要生产水稻，目的是为了减轻国家负担，缓解部队粮食不足问题。因此每到春季播种和秋季收割时，都要从所属部队抽调人员进行抢种、抢收。

当年的盘锦,各方面条件还相当艰苦，民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叫作：盘锦大地红烂漫，土墙草房泥土路，茫茫一片芦苇荡；常年刮大风，难见晴朗天；出门风夹灰，雨天一身泥。还有一句是说盘锦大地有四大怪现象,即：马车要比汽车快，大姑娘也叼旱烟袋，老母猪系上裤腰带，糊窗纸儿贴在窗户外。这是对当时盘锦环境和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1979年5月，我任扫雷舰副政委，带领从各舰艇抽调的30名官兵来到盘锦农场参加插秧任务。靠这30人要在40天内完全用手工完成120亩的整地、拔秧和插秧任务，工作量当然是十分繁重和艰巨的。再加上官兵们的伙食标准由舰艇灶每天1元2角3分改为地勤灶每天4角3分，以及大部分战士都是第一次参加插秧，有的甚至连秧苗都没见过的，这无疑给完成任务带来极大的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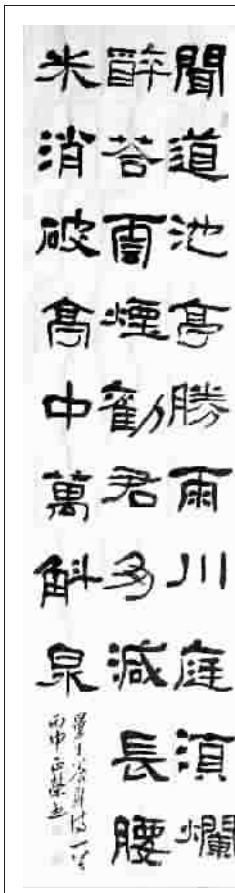
插秧既要体力，还要懂技巧和有耐力。所插的秧苗既要横平竖直，整齐划一，又要深浅适度，太深了，则成活慢；太浅了，则会飘浮在水面上而不能成活。于是，我根据入伍前曾在自己家乡种过稻、插过秧的经历，与大家商量，将30人按照熟练程度和根本不会插秧的进行搭配，组成三个互帮互学小组，结成一对一或一对二的帮教对子，开展比学赶帮的竞赛活动。同时，为了尽快提高插秧技艺，还特地请来小老乡，时任农场会计员的梅荣和司务长肖勤煊作现场指导，传授技艺。在他俩的精心指教下，大家很快掌握了插秧要领，并增强了信心，增添了干劲。

5月的北方，早晚气温还是很凉的，但是因为一切农作物的播种到收割都有它的生长过程和生长周期，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否则都会影响稻谷的成长和收成。于是，为了不误农时，天还蒙蒙亮，我们就迎着寒风、踏着露水出工了。大家按照整田、拔秧、挑秧、插秧、护苗和补苗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尤其是到了插秧阶段的一个多星期内，官兵们起早摸黑，光脚踩在烂泥里，进行紧张有序的拔秧、挑秧、插秧，30人每天要完成20多亩地的插秧任务，常常为了不失时机而争分夺秒，连中午饭都在田头匆匆吃完后便急速地赶回田间，直到太阳落山，余辉褪尽，才依依不舍地爬上田埂。最后几天,还要进行护苗和补苗，就是将被风吹倒的秧扶正，将被水冲掉的秧补上，一直到秧苗全部长直长齐就算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就这样，连续奋战40天，尽管官兵们个个累得腰酸腿疼，浑身上下像散了架似的变了形，有的因挑秧而磨破了肩膀，有的因插秧而磨坏了手指，有的被蚂蟥叮咬得满腿红肿，个个脸上都被晒成了古铜色，大腿以下双肢皮肤犹如黑炭。但是当看到那一片片映着天光云影的齐刷刷、绿盈盈的稻苗像“绿色地毯”似的铺满了田间，贪婪地嗅着稻苗的清香时，大家心里美滋滋的，浑身的酸胀疼痛烟消云散，无影无踪。

盘锦农场插秧，既是一次劳动锻炼，更是一次情意的结合。

如今，37年的时间如流水逝去，但当年插秧时那精神饱满，你追我赶，相互帮助，同心协力，默契配合，其乐融融的情景，以及那波光滢滢的稻田里混杂着泥土的腥味，青苗的甜味……却时常荡漾在我的心间。



书法 闻正荣

来自银杏树上的爱

蒋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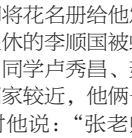
今年的五月，一对斑鸠夫妇乔迁到院中的银杏树上。

记得那时，常常看见它们衔着不知从哪里觅来的树枝，日日往复飞落。我多想伸出人类的友谊之手帮它们啊！可转念一想，也许人类所有莫名的举动对于它们而言都可能是一种伤害。所以，只能默默地看着它们每天如此艰辛的往来着，不敢惊扰。于是，银杏树上的斑鸠夫妇成了家里闲时的茶间话题。

起初，每每傍晚时分，斑鸠夫妇比翼飞落歇息在那看似并不牢固的银杏树杈上。而后的日子里，却再也寻不见它们双飞双落的身影了。心开始焦急了！透过重重的树叶隐约可见一个灰褐色的身影一动不动地停留在窝里，就这样我每日一趟趟地前往看望是否安好。

上海的五月正是雨多时节的黄梅季，然而偏偏此时的它们，产下了爱的结晶。它们心照不宣的遵守彼此的约定，轮流觅食与留守。从此，晨起暮落，朝夕阴晴，我的心开始紧紧地惦记上了！又是一天的大雨，枝上的那只吃饭了吗？会被淋病了吗？小家伙要多久才能孵出来？一直趴在窝里一定很累吧？外边的那只千万别成了人类的桌上餐！好想给它们搭个雨篷……诸如此类的想法伴着雷声隆隆的天气越加猛烈！日月星辰往复着，小家伙终于破壳而出。电话那头听到家人提及，我迫不及待地想归家瞧瞧这个使我许多昼夜惦念着的小生命。

万物的精灵啊！你是如此的执着，如此的坚强，这就是爱的力量！上天公平地赐予了世间生灵与生俱来的共同天性—爱！在地球的另一边称作—love！我不懂它们的国度语言，它们也不明了我的国度言语，然而，爱却是相同，相通的。我想，也许这就是我们之间唯一可以沟通的言语吧。



今日午间，小家伙居然飞落在我窗前的树枝上觅食。转眼间它已经长这么大了，可惜不知道是姑娘还是小伙子？查阅过资料，一般斑鸠一窝会下两枚蛋，可能因为雨大，天热，环境的影响，只幸存了这一只。多么孤单的身影啊！那只未被孵化出的一定让斑鸠夫妇流了很多的泪！如今的生存环境，对它们而言除去恶劣的气候就是人类可怕的味觉了！总之，这个风雨得来的生命如此不易！我悄悄地拿起手机留下了它并不清晰的背影，感慨着生命的奇迹！你要好好地活着，珍惜日起日落里的每一个日历，这一切都是你的父母不惧风雨，不惧一切的生命危险才有今日的你。

寄语

仲萱怡

一次次的起飞降落都将我送到目的地。在飞机的另一头，有时是殷切期待的旅程，有的是久违的聚会，有的是不情愿参加的会议。在飞机上的时间总像原本生命中不存在而窃窃赚来的一样。而这赚来的时间也总伴随着一点点风险——气流。碰到气流时会发现不管做什么动作，摆什么pose都无法安慰自己，只能静静接受着自然的风力与抗力之间较量的平衡。时空的速度夹杂着生命的速度，很神奇。虽已完成了几百次飞行，可对于时空的变化仍觉得很奇妙。

机场，又爱又恨的地方。有太多的说不清楚，演出着一幕幕的离别重逢。心血来潮地到机场兜风，站在展望台上看着一架架客机迎着夕阳在微风中掠过。第一次，不是乘客，不接机，不送机，不带任何情感只是静静地欣赏，真好。一架客机长空跃起向天边的晚霞展翅奔去，它承载着怎样的梦想？多少思念？礼物？还是多许埋怨与不安？又有一架客机在被夕阳染红的帷幕下低低盘旋，慢慢降落，然后作为乘客的你们就要在我所在的城市里奔走，完成各种使命。

嗨，那个穿夏威夷大花衬衫的大叔跟旁边挽着他手臂的招展大妈走向了停车场，他们是二婚蜜月么还是相濡以沫的老伴？那个高个子的欧巴，穿着NIKE针织卫裤，脚踏NIKE大钩招牌鞋，推着行李车与同伴说着夹杂胶东口音的拗口普通话，很兴奋地言语。哦，看来是接到了老朋友在一一道来下面的行程安排。就这样，在机场呆呆地做人间观察好像也蛮有意思的。

看着看着，飞着飞着，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日子也消失于一次次的旅程里。

同学花名册

杜剑虹

当年，我们老三届的“毕业季”，稚气尚未脱尽却“工矿农村”地奔向天南地北、四面八方，那种“别离滋味浓于酒，着人瘦”的浓浓愁绪，是时代给与老三届的特别赠予。但毕业前夕有一件温暖的事印象深刻。记得1968年秋的一天，我独自踯躅于校园里，对曾经以大量知识濡养我成长的一草一木报以深情的行将告别的注目礼。此时校园里人烟稀少，不觉中来到教导处，教导主任严理平老师正在办公室，办公桌上摊放着各班同学的花名册，不由兴趣陡升。在征得严老师同意后我聚精会神地将全班同学的姓名、地址全部抄了下来，连带全校教职员工的名单也一并抄了下来。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将中学生活的美好历史片段，借助这份花名册留存心底。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偶尔会从箱底翻出来咀嚼一下青少年时光的青涩滋味。没想到当年一个举手之劳，在几十年后可以让我们师生得以重新相聚！

当我们这些同学整体跨入花甲之年行列之际，我们的班主任张寿钧老师一个弥足珍贵的念头，让我们师生有了欢聚一堂的可能。2010年春，张老师作为任课老师接受其他班级同学聚会的邀请，感受到浓烈的师生情、同学情，不由陡生感慨：什么时候自己班级的同学能够相聚一堂就好了。于是，张老师通过前任学校的得意学生找到了他学生的妹妹钱小娟。钱小娟是我们班级的同学，由她起头滚雪球般“滚”出了包括笔者在内的最初6个同学。当时我赶紧从箱底翻出花名册电传给张老师及其他同学，张老师收到后非常高兴，说他作为班主任都没有这个花名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6个同学并没有办法继续“滚”出其他同学。

从市教委巡视员岗位上退下来的张老师，如今独自住在浦东秀沿路一个高级老年公寓里。我们6个同学相约去看望张老师，数十年后师生相见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张老师虽然是个已近八秩的老人，但除了头发全白外，变化并不大，精神矍铄得让人羡慕。在张老师处大家交谈时，有同学说曾在路上偶遇我们的老班长、班里唯一一个在部队营房长大的北方人李顺国，据说他在边检站当翻译。当时我听到“边检站”，便联想到经常为我任职的地区报社投稿的边检站唐警官，没费什么周折便得到了李顺国的家庭电话，我当即将花名册给他发过去。已经退休的李顺国被虹桥机场返聘，同学卢秀昌、茹文敏离李顺国家较近，他俩一起找到他家对他说：“张老师特别喜欢我们的女班长焦金娣，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找出来。”李顺国接到这个“指派”任务后，开始是无从下手，后来灵机一动，找上了公安局老朋友，利用空余时间将同学的姓名、地址输入电脑进行搜索。于是乎，一个个同学被挖掘“出土”。

2011年教师节那天，是我们同班同学40多年来第一次与班主任老师张寿钧、副班主任老师柴霞珠、施慧敏相聚在一起，为我们敬爱的老师送上迟到的、带着岁月沧桑却又是深情的节日祝贺。席间，李顺国走过来对我说：“他们都说我们今天能够相聚在一起，是我的挖掘功劳，我说那全是你提供的花名册的功劳。”我说：“我的最大功劳是把你挖掘出来。我们今天能够相聚在一起，其实班主任张老师才是最大的功臣。”

十日谈 毕业季

“浮沉惊梦毕业季”，当年的点滴记忆犹新。